

【名家背影】

□吕家乡

1979年6月，罗竹风先生挑起了《汉语大词典》主编的重担。山东是该书的协编省市之一，因此他每年总要来济南巡视，几乎每次总要通知我和一些老同学去聚谈；有几次他的亲友设家宴招待他，他也让我去作陪。他既不让我汇报自己的情况，也不单独对我嘱咐什么，只顾随便地和大家交谈。每次见他，我总得到多方面的教益。我想，也许罗师就是为了让我在他身边受一些熏陶吧？我已多年不记日记了（由于日记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），有时却不记得记下跟罗师见面的情景。

罗师参加大小会议都很认真，聚精会神，有时还做笔记，而且不接电话，不见记者。而在会下跟朋友尤其是跟“老”学生交谈时，又显得那样从容悠闲，谈兴极浓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贴心话而没有任何事情等着要做。他说：“跟当年的学生谈心是我这样的老年人的一大乐趣。”我们知道，他大概要用开夜车来补上谈心耗费的时间。

很疲劳，又很从容——这是我对罗师的最初印象，这印象后来更得到加深。同时，我又发觉了罗师的另一特征：有痛苦，但很顽强乐观。他的痛苦是多方面的。多病缠身使他常有力不从心之叹。几个女儿散居各地。唯一的儿子在左潮摧残下得了精神分裂症。师母张秀珩由于在“文革”中备受折磨，多年卧病后于1984年去世。他和师母曾一同在北京读书，由恋爱而结婚，几十年风雨同舟，尤其在十年浩劫中相互鼓舞、相濡以沫。师母去世对他打击很大。我致信慰问，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，其中说：“秀珩同志走后，对我当然是严重的打击。所幸身体并不算坏，以‘忙’制‘愁’，我以74岁高龄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这样可以忘怀一切。但午夜梦回，无与语者，自然感到更深切的悲哀。这是无可奈何的，只好听之任之。”

罗师怎样“以忙制愁”，我

罗竹风先生(下)

如今我已80周岁，对许多人、许多事的看法较之年轻时有了改变，但罗竹风先生一直是我心中不灭的明灯，永远照耀着我的人生旅程！



罗竹风先生

读了他的文集才有所了解。刚刚安葬了师母，他就在一个会议上做了《语文漫谈》的学术报告，接着又赴京开会。就在开会的间隙，他在9月5日的同一天写了《〈古文今译〉序》和《沙滩上的红花》两篇文章，后一篇是怀念他在北大的女同学陶凯孙的，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女性，竟在延安死于康生的迫害。我觉得罗师在这篇抒情散文中移注了他对师母的深切怀念之情。

1988年春天，罗师在济南患了病，我去看望他时，他正在抱病阅读一部书稿的清样，准备作序。他说：我为别人作序起码坚守两条，一条是从不违心地胡吹乱捧，另一条是认真地读完书稿。他为之作序的书，从《中学语文教学探索》到《中国人怎样管好饭店》，从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到小学生

佳作选，从宗教方面的专著到成语故事连环画，真是五花八门，他为了作序花费了多少心血！

1993年，罗师查出骨癌，住进医院。医生要他停止工作，静心疗养，他的打算却是“移地办公”，一篇又一篇新作在病房里完成。他不以自己的病痛为意，却挂念着我这个学生的身体，让我注意养生之道，并向我介绍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。

正是基于他这种“以忙制愁”和“移地办公”精神，罗师晚年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。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：他于1991年编定的文集《行云流水六十秋》共85万字，其中60多万字写于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，即他68岁之后。这些文章只是他零敲碎打的副产品，他更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下列大型工程：

1979年国庆30周年前夕，他担任常务副主编的《辞海》（合订本）出版，1989年又增订250万字出版。

1987年和1988年，他主编的《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》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宗教卷》相继问世。当年罗师调任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时，“宗教是麻醉人们精神的鸦片”的说法还被奉为经典，多年的宗教事务工作经验促使他突破了框框，形成了“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”的看法，这成了贯穿于新著核心理念。

1985年至1994年，他主编的《汉语大词典》共13卷陆续出版。这部巨著共约5000万字，收词37万余条。1994年5月10日，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隆重庆典。

此外，他所主编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也分卷陆续出版。

这些具有开拓性甚至划时代意义的巨著，既是集体的成果，又凝聚着罗师的心血。从编纂方针、纲目、部首的确定，到各地编写队伍的组建和协调，他都具体过问。

他不仅亲自参与撰写，那字数达天文数字的全部书稿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推敲和审定。对于一个多病缠身的老人来说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他这种老而弥坚、“以忙制愁”、勤奋攀登的劲头是哪里的呢？我起初以为是来自他的使命感和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”的紧迫感，后来才知道这理解是肤浅的。有一次谈到发牢骚问题，他说：“不能不让群众发牢骚，但我们共产党员，尤其是党的干部不应当发牢骚。我们对人民欠了债，全力以赴还债都来不及，哪有工夫发牢骚？”原来罗师的动力就是“对人民欠了债”的负疚感！罗师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，是“打江山”的功臣，却从来没有“坐天下”的观念；他在“文革”前就和张春桥、姚文元做过斗争，却从不以此炫耀。有功不居功，却满怀“对人民欠了债”的负疚感，这是何等心胸！

1993年前后，同学们准备为罗师举办“学术成就研讨会”，他极力劝阻，在一次来信中说：“我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，现年83岁，经受过不少磨难，但学无专长，不过是一名‘杂家’而已。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，在学术领域如宗教学、语言学、辞书学等方面也不是毫无建树；但总的说来，多属鸡零狗碎，不成体系。鲁迅翁有言，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，无异于谋财害命。我非木石，岂能连这点道理也不懂！”

遵照他的意愿，“学术成就研讨会”作罢。我们深知，罗师留下的何止学术成就，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高度不是更将彪炳史册吗？初识罗师时我只有16岁，如今我已80周岁，对许多人、许多事的看法较之年轻时有了改变，但罗竹风先生一直是我心中不灭的明灯，永远照耀着我的人生旅程！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）

京剧《除三害》演绎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。

剧中人物周处，是一个性格、品行充满矛盾的人。一方面他仗着虎背熊腰、臂力过人，终日佯狂市井、横行霸道、欺压乡民。口中饥渴，就到酒楼茶肆白吃白喝；手中缺钱，就到“各业行商”索要“常例银子”，稍受怠慢就动手打人，甚至“断人生计”。因此，宜兴百姓把他与“猛虎”、“孽蛟”并称“三害”，称得上是个恶人。另一方面，他又豪爽仗义，惜老怜贫。当“独自一人，无依无靠”的田大娘被债主逼债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及时伸出援手，赶逼还债人，并赠送银两，要田大娘“拿回家去买些柴米度日”。在田大娘眼里，

【菊园漫笔】

《除三害》：

浪子回头金不换

□王庆新

“周大爷可真是个好人行。”

上述看似矛盾的表现，实际说明周处的“恶”不是本质上的“恶”，而是因自幼父母双亡、无人管教，以致他缺乏辨别是非、善恶的能力，只会盲目而行，率性而为，同时也说明他存在由“恶”变“善”的可能性。

周处很幸运，遇到了新任宜兴太守王浚。王浚听了乡邻对周处的控告，没有像众人希望的那样“速速拿办”，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他并非怙恶不悛之輩，有改恶从善的可能，而且认定要让他改过自新，靠寻常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行，必须对症下药，出奇制胜。于是，观众看到了如下好戏。

大街之上，乔装成“老丈”的王浚，看到醉醺醺而来的周处，故意对天长叹：“唉，看来不成世道了！”周处问他何故作此长叹，王浚说因为宜兴地面“出了三害”，“民不聊生”。周处问是哪三害，王浚答“第一害那南山出了猛虎”，“行路人遇者它难以逃生”；“第二害它比那猛虎还狠”，“长桥下又出了魔怪蛟精”；“若论那第三害越发可恨，它比那南山的猛虎、长桥的孽蛟还狠十分！”周处问：“它又是何禽兽呢？”王浚答：“第三害与虎蛟不能同论，他本是一个有须眉、有志愿、雄赳赳、气昂昂，是一个有力之人。”周处不解：“既然是个有须眉的汉子，怎么把他列在这三害之内呢？”王浚说：“只因他父早亡无人教训，因此上成下流作恶欺人。”

话说至此，观众早已明白“第三害”指的是谁，可这位周大爷还要“打破沙锅纹(问)到底”：“那被害之家为什么不到县衙去告他呢？”王浚说被害人“怕的是告不成大祸临身”。周处哇呀大叫：“听一言来火难忍，豪杰动了杀人心！这厮他叫何名姓？我要扒他的皮，我抽了他的筋！”周处的“侠肝义胆”被激起来了，他也就被王太守结结实实地“绕”进去了。看看时机成熟，王浚才“抖包袱”说出“他姓周名处字子隐”！

周处闻言“好一似霹雳当头震，心如刀割汗淋身”，他以为自己是个“奇男子”，想不到“三害”会有他的名。不过，他的确是条汉子，在“自愧自怒自伤情”的同时下定决心：“我不除三害誓不为人！”经过一天一夜的浴血搏斗，他果然把猛虎、孽蛟都杀死了。然而，当他筋疲力尽、伤痕累累地回到岸上时，更加让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：众人误以为他已与孽蛟同归于尽，正在“把酒庆贺”。严酷的现实告诉他，他并未因除掉两害得到乡邻的宽恕。这让他十分沮丧，痛不欲生，想“提剑自刎”。这时王浚及时赶到劝解，肯定周处“今灭虎除蛟为宜兴除害，其功非小”，希望他“痛改前非，立志报国”。周处接受王浚的训诫，拜别乡邻，“去往京师，投访名师”。后因“励志好学”，终成品学兼优、文武兼备的人才，受到当政者重用，官至东吴御史中丞，且为官清正，受到民众赞誉。

《除三害》以一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只有树立正确的道德观，具备明辨是非、区分善恶的能力，才能把握方向，走上正道，成为对社会、对民众有用的人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。反之，如果荣辱颠倒、是非不明、善恶不辨，只能南辕北辙，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，而且本领越大，为害越重。

（本文作者著有《京剧优秀剧目欣赏》一书）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叶兆言

鲁迅曾经最痛恨的人

文人相轻，吵吵架，红个脸，说几句狠话，本是思想自由之体现。这场争斗过后，鲁迅与陈源也见过面，两人还握了手，并不是你死我活。



陈西滢与妻子凌叔华

头烂额。最后终于辞去教职，从政，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，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首席代表。

有文章说陈源很会骂人，与鲁迅打笔仗，也算棋逢对手，触到了对方的痛处。我觉得这有些想当然，过分高估了

陈源。陈源大绅士，英国味道太足，文化有余，幽默凑合，说战斗性就那么回事。他与鲁迅交手，也与周作人和刘半农对过阵。说岁数，陈源年轻许多，学历高出不少，可是一点都不气盛，基本上处于下风，年轻管什么用？

因为鲁迅，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，陈源往往是反面角色。后来翻案之风盛行，不时地有人出来为他说话。确实事情也没多严重，文人相轻，吵吵架，红个脸，说几句狠话，本是思想自由之体现。这场争斗过后，鲁迅与陈源也见过面，两人还握了手，并不是你死我活。

一直觉得陈源欠个道歉，证据确凿，鲁迅没抄表，胡适出面打过圆场。对方会不会接受道歉不重要，以鲁迅的脾气很可能不需要，但是对于有绅士风度的陈源，认了错心里反而更踏实一点，抄袭就是抄袭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）

写完了竺可桢，情不自禁想到了陈西滢。陈西滢就是陈源，就是那个写《西滢闲话》的作者，那个曾经让鲁迅最痛恨的人。鲁迅骂人一向厉害，喜欢痛打落水狗，他如此这般痛恨，死活不肯放过，不是没有缘由。堂堂北大教授陈源，居然写文章说他剽窃，白纸黑字，男盗女娼是最歹毒的骂名，鲁迅焉能咽下这口恶气？

陈源有个小妹叫陈汲，是竺可桢的后妻，竺的前妻是民国名女子张默君的胞妹，两位妻子一位有个不一般的姐姐，一位有个不同寻常的哥哥，倒也是个有趣巧合。陈源与竺可桢似乎没什么太多交往，这妹夫要比他大好多岁，他们算不上一路人。